

呼喊 在风中

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

王磊光 著

在阿富汗贫民营，一个士兵对伟大的女作家多丽丝·莱辛说：『我们大声呼喊向你寻求帮助，但风把我们的话吹走了。』我写下这本书，也许同样是对着风呼喊吧。

 復旦大學 出版社

I267.1

800

王磊

I267.1/800

2016

在风中呼喊

博士生的返乡笔记



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



C00471675



 复旦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呼喊在风中: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/王磊光著. —上海:复旦大学出版社,2016. 1
ISBN 978-7-309-12042-4

I. 呼… II. 王… III. 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. 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317712 号

呼喊在风中: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

王磊光 著

责任编辑/李又顺 关春巧

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:200433

网址:fupnet@fudanpress.com <http://www.fudanpress.com>

门市零售:86-21-65642857 团体订购:86-21-65118853

外埠邮购:86-21-65109143

上海市崇明县裕安印刷厂

开本 787×960 1/16 印张 16.5 字数 221 千

2016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8 000

ISBN 978-7-309-12042-4/I·964

定价:35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。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呼喊，在风中（自序）

王磊光

大约是在 25 岁之后吧，我常常想起古书上记载的两个人。倘在孤夜里想起，又由他们想及现实中的许多人和事，竟扑扑地落下泪来。

我说的第一个人是个贵族，就是宋襄公。襄公与楚人在泓水作战，楚人渡到河心，襄公不肯出兵攻打，并说这样做就好比人家处在危险之中，你却要从背后推他一把；楚人上了岸，襄公依然要等到他们排列成阵势，鸣鼓后才进攻。可楚人并不是那么讲规则的，上了岸就开杀戒，襄公大败，且受了腿伤，第二年就去世了。

要说的第二个人是个平民，叫尾生。上古之时，原是可以自由恋爱的。尾生在桥下约会，心上的姑娘却迟迟没有出现。河里涨水了，尾生抱着桥柱不肯离去，终于被大水淹死。

年少的时候，也跟着大家一起对襄公、尾生极尽嘲笑，笑他们的愚蠢。但随着年岁渐长，阅世愈深，忽然在某一时刻惊悟自己是多么浅薄。我们的时代最不缺的就是聪明人，缺“傻子”。像襄公、尾生这样的“愚人”，恰恰是他们心中有秩序，有敬畏，有仁、有信，如日月高悬，坚

守在人类的天空上，照耀出当下是多么猥琐和混乱。

这是我的第一本书。写作的过程，也是身心还乡的过程。借用别人的话来说，谁的家乡不在沦陷？所以这种还乡是苦痛的。眼看着要成为一本书的样子，我终于不肯再多写一个字，然后便是长长的一段空落和苦闷，不知所措。就在这时候，襄公和尾生，又回到了我心上。

我的内心当然是黑暗的。我写了乡村的故事，也写了我的忧愤，但我的文字却称不上“乡土挽歌”——满眼的破碎与凋零，又如何能歌？而且我也非常清楚，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构造，乡村的流逝大概是无可阻挡的。

写这样一本书又如何呢？

我稀里糊涂地进入家乡的内部摸索了一番，又稀里糊涂地记录着它，中途一度辍笔——因为我发现进入家乡越深，便越不知它究竟是个什么样子。这时候，一个叫雷蒙·威廉斯的人救了我。他说：“文化是整体的生活方式。”这句话被认为是威廉斯给“文化”下的一个定义。我自然是笨拙的，在别人看来极为简单的一句话，却一直感觉甚为抽象。但当我站到乡村的大地之上，吸收着泥土的灵气，忽然明白：威廉斯大约并不是要给文化下一个众口流传的定义，而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视角——从生活方式的角度去认识文化。所以你要问我写了什么，我会说我写的是乡村生活方式的变化。

梁漱溟说他那个时代乡村破败的原因在于文化失调。教化、礼俗和自力（理性），这些是文化的核心部分。历史绕了一个圈，仿佛又回到了梁漱溟的时代。“物”的败坏，尚可恢复，或者创造更新的，而“文化精神”一旦败落下去，要拯救回来，怕是难以计算时日。

古人说：“礼失而求诸野。”倘“礼”在乡野也找不见了，我们又该到何处找寻？

当年鲁迅先生呼吁那些已经觉醒的大人们，“背着因袭的重担，肩住了黑暗的闸门”，放后辈们到“宽阔光明的地方去；此后幸福的度日，合理的做人”。但今天的问题却是大家普遍没有了“因袭”的担子，也就没有几个人愿意去肩住黑暗的闸门了。

不过，事情也还并未坏到令人窒息的地步。襄公、尾生这样有着圣贤之德

的人，的确是找不见了，但在荒芜的大野上穿行之时，我还是能够看见一些令人欣慰和振奋的亮色，闪烁在乡村的暗夜里。

长久以来，对于自己的身份，我充满了迷惑。如果说我是农民，但我一直身处校园，早远离了稼穡。倘说我是知识分子，但按照世俗的标准，知识分子自然是要生活在城里，有着较好的物质条件，在利益层面能够为自己说得开一些话。显然，这些我都不具备。我不但没有在任何一个城市落下脚来，还始终脱不净乡下人的泥土气。况且，我也融不进知识界的种种小圈子，亦不喜欢“形而上”，不擅长高谈阔论，“热闹是他们的，我什么也没有”。

陶渊明说，从前那些大好光阴啊都误落在尘网中，是个大大的错误，但往日虽不可追回，未来却是可以选择的，我要归园田居。毫无疑问，我没有陶公那般勇气和境界。我要是真想着回家去种田，为祖国多生产一些粮食，我的父母一定会羞愧而死，父老乡亲的唾沫也不会饶了我。然而，这些年来，我回家的次数也的确是越来越多了。寒暑假必回去，平时有机会也一定回去。因为父母都老了，身体也不好；年过七十还种着三四家田地的大父（大伯），已咬不动稍硬的食物了；大舅的听力越来越差，走山路也越来越困难了；而身体极健壮的姑爷（姑父），已埋于黄土底下。

最近，一个朋友对我说：他想回到武汉找点事做，也便于常回家看看。他家住在大别山主峰脚下，回去一趟委实不容易。他曾是我极好的朋友，却在高中毕业后十几年里杳无音信，前些时日才联系上。他知道我家在哪里，曾在2008年骑摩托去找过，半路上摩托车链条断了，只好折回。后来又从网上读到我的文章，并搜到E-mail，却又不给我留任何信息。他说：“没有交集，就没有深究。”那些年他大约过得不好，四处漂泊，才有了这样的想法。这两年有好转，在一家企业当总监，每月有一万块钱的收入，但还是买不起房。聊起这么多年来对于回家的感受，他的原话是这样的：“开始不想回家；后来，觉得应回家；现在，想回家。”只需要排列一下句子，他的话就是一首质朴的诗。诗是痛苦的产物，他的感受又何尝不是无数乡村子弟共同的感受呢！

就在昨夜，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醒来后梦境还异常清晰，仿佛真的经历过

一般。在梦里，我与童年的伙伴到河上玩耍，走到一个浅水潭边，看见两只小龟浮在水上，见人来了亦不逃走。我们都觉得奇怪，因为这条河上已二十多年没有见过乌龟了。我们把小龟捉上来，放在水盆里。一只龟却开口说话了，说她是我的外婆，她死后，舍不得离开生前住过的埝子，就没有投胎转世，而是变作了乌龟，住在埝子旁的河里。她还说，这水潭的沙底下总共藏着五十多只龟，他们都是从古至今没有去投胎的亡灵，生前就住在附近埝子里，死后仍舍不得离开这儿。外婆享年89岁，过世已经五年多了——她在80岁的时候还要上山摘菊花，卖出的小钱舍不得用，定要留给我拿到学校做生活费。如今，外婆是一只小龟，惦记着人间的情意，整日在血地的河流上游过来又游过去。

回到乡下，我常会坐在无人的山岗上眺望、倾听，我在眺望和倾听脚下的土地。慢慢地，心里头便会升起一股温暖的泉，生出一些奇怪的想法来，竟感到莫名的幸福：城市人虽然拥有这个时代，但我们乡下人却拥有一块埋人的土地。

这本书的写作，大约就是这样一种归根结蒂的过程。我的乡下人的自信也随之变得越来越理直气壮了。我也更加有意识地将自己与学院派区分开来，我对自己说，我跟他们是不同的：今天能够在学院里扎下根来的，或者还并未扎下根来却已读到了博士的人，多半有着小康以上的家境——即便少数出身底层，也大多是在半途上就脱胎换了骨的。所以，我与他们，到底是不同的。他们绝大部分人习惯于眼睛朝上看，但我，要注目于脚下的泥土。

“我们还要发愿：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。”

然而，我又突然变得犹疑，乡下人胆小怕事的本性再次暴露：我看到一个如天马行空般的“我”，正回头注目于现实中那个渺小而窘迫的“我”。在阿富汗贫民营，一个士兵对伟大的女作家多丽丝·莱辛说：“我们大声呼喊向你寻求帮助，但风把我们的话吹走了。”我写下这本书，也许同样是对着风呼喊吧。

提及这本笔记的缘起，还得从一个“媒体事件”说起。2015年春节前夕，因罗小茗老师的邀请，我在一个论坛上作了名为《近“年”情更怯》的演讲，稿子随后被媒体以《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》为题发表，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，甚至被很多人认为是2015年开春最热的一篇网文。复旦大学出版社的李又顺

老师随即找到我,一开始在电话和短信中我是拒绝的,但在上海与他初次见面时便相谈甚欢,因为我们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,对于文学和乡村,也有很多共通的感受和见解。就这样,我一口答应了下来。

没有罗小茗老师为我创造的机缘,没有李又顺老师持续的鼓励和敦促,也就没有这样一本乡村书。

早在2004年,导师王晓明教授去我的家乡L县调研,就写过一篇影响巨大的文章。十年后,我写了这样一本关于家乡的书。我的书,自然是受了老师的启发,在内容和主题上,也与老师的文章相呼应。在本书初稿完成之际,我有幸在加州大学 Christopher Connery 教授的帮助下,来美国学习一段时间。中外城乡现实对比,让我有了更多的思考和更新的理想,可惜这些都没有来得及写进书中。

这本书,

献给我的老师王晓明教授,Christopher Connery 教授;

献给搞了四十年基层工作的大父,当了一辈子乡村教师的大舅;

献给我那节衣缩食,备尝艰辛的父亲和母亲。

2015年12月9日

目 录

呼喊,在风中(自序) / 001

近“年”情更怯 / 1

为什么我们越读书越困窘 / 14

我们将无路可退 / 20

别了,家乡的板栗 / 25

表哥的亲事 / 29

母亲的初夏 / 33

父亲的信 / 37

孤独无依的人 / 42

二父住院记 / 46

一个人的生存 / 56

一位乡村教师的命运 / 59

城市鱼:她们背着婚姻漂流 / 75

一个乡镇公务员的自白 / 81

我们成了故乡的过客 / 85

“我一辈子的苦都在这里受了” / 96

放蜂人 / 105

单身老汉的爱情故事 / 109

圣山垭的守望者 / 115

无声的乡村 / 127

乡村动物记 / 133

活着活着就走了 / 148

无力自卫的乡村 / 153

饮水史 / 156

渔事 / 159

大雾山上桐花祭 / 165

山乡杂记一 / 169

山乡杂记二 / 177

水库的黄昏 / 184

为了什么去农村 / 195

从梁漱溟的困境看今日的乡村动员 / 199

第一代农民工,故乡拿什么迎接你 / 205

老人农业有效率吗 / 210

寻找乡贤

——关于城乡关系的随想 / 214

在今天,谁来赡养乡村老人? / 218

附录一:写给家乡的诗 / 222

打要 / 222

父亲的生日 / 223

还乡 / 224

静默 / 227

墓地 / 227

熟了呀,稻谷 / 229

附录二:L县见闻 王小明 / 232

编后记 / 249

近“年”情更怯

“有故乡的人回到故乡，没有故乡的人走向远方。”我很庆幸我有故乡，可以随时回去，尤其可以回家乡过年。因为我的根在那里，我的亲人在那里，我的生活经验和记忆在那里。

我的家乡在湖北的大别山区，L县。我导师王晓明教授在2004年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《L县见闻》，写的就是这个地方。王老师的文章以我家乡为对象，揭示了当时农村的破产状况、人的精神颓败以及乡村文明的没落。

我家所在的那个村子，是一个东西两座大山夹住的狭长谷地。一个村子由十来个“塆子”组成，一个塆子有几十户人家，我家所在地叫王家塆。直到现在，我每到一个地方，凡是碰见两山相夹或两排高大的建筑物相夹，我的第一意识就是，这两座山或两排建筑物，一个在东，一个在西，所以我在外面经常迷路，尤其在城市里。

上海地铁7号线有两个靠得比较近的站：“长寿路”和“常熟路”站。我好几次下错站，以致现在每到这两个站就紧张，怕弄错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我家乡的方言里，“长寿”和“常熟”是完全一样的读法。人要靠语言来思维，这件事情让我意识到：对于有家乡的人来说，是用方言来思维的。

我有一个初中同学群，群里90%的同学只读到初中就出去打工。经过十七八年的积累，很多同学在城市里有房有车，有的还有了自己的事业。平时在群里，他们交流最多的是工作问题、车子问题等，言谈中总少不了炫耀。但有一次，有个同学忽然在群里说，他已经三年没回家过年了，另一个同学紧跟着说，

他五年没回家了，接着很多人纷纷说起回家的情况。有一个说：不管怎么样，今年过年一定要回一次家！另一个说：如果能在家乡找一个两千块钱的工作，就回去算了。还有一个说：要是能找个每个月一千块的工作，我这边什么都不要，也愿意回家。

我有一个从小学到初中的同学，已经十年没有回家。有一天他在QQ里突然对我说，我的父母是很好的人，因为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去我家玩，我爸妈用腊肉下面条给他吃。这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小事，他还记得。其实我知道，这是因为他太想家了。

回家过年，其实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一件事。套用贾平凹的话来说：家乡对我们的影响，就像乌鸡的乌，那是乌到了骨头里面。

回家的交通

十多年前我上本科的时候，从大西北到武汉，坐的是那种编码没有字母只有四个数字的绿皮火车，22小时，通常还要晚点两三个小时。西北往武汉的路线，自然不是人流最多的，但春运那个挤啊，恐怕大大超出了今天90后的想象。好在那个时候，学生一般都可以提前集体订票，买得到座位。而站着回家的，几乎全都是农民工。每次上车的时候，无论有票的还是没票的，都一窝蜂往车上挤。

我对过年回家的第一印象就是：我背着一个包，提着一个包，与同学一起，在站台上从第一节车厢狂奔到十几节车厢，然后被后面的人推着挤上了车。上车后一分钟左右，车就开动了。我记得火车广播里号召大家发扬风格，让站着的乘客往座位上挤一挤。大家真的很友好，四个人的座位，往往挤了五六个人。火车过道里人贴着人，想蹲下来都没有办法，连厕所里也挤着好几个人。

要上厕所了，男乘客还可以想办法，可苦了女乘客。记得有一次我身边坐着一个在西安读书的大学生，他要小便，就脱下外套让我给他挡住身体，想把尿撒在矿泉水瓶里，但他很紧张，用了十几分钟才勉强撒出来。我还记得有一次身旁坐着一个从西北打工回家的河南妇女，尽管有位子，但她实在太困，太想睡

觉了,就把位子让给别人坐,自己钻到座位底下睡觉去了。

应该要肯定,我们国家这十年间的铁路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,铁路线路的增加,尤其是动车和高铁的开通,极大缓解了交通压力。火车站、火车上,起码不会像过去那么拥挤了。

过年回家那种路途的遥远,时间的漫长,竞争的激烈,火车上的拥塞以及各种不安全感,让我对“男儿有志在四方”的观念产生了极大厌倦。所以,本科毕业时,我找工作坚决要回到湖北。后来我就在老家隔壁的县城一中当语文老师。自2004年到2011年来上海读研之前,我再也没有遭受春节回家难痛苦了。尽管从隔壁县回家的汽车在过年时依然被塞得满满的,但毕竟只有两个多小时,实在挤不下,还可以花两百多块钱请出租。我在上海读研的这几年,其实也没有遭受回家难痛苦,因为上海到武汉的高铁和动车很多,普通车也有几趟,买票很方便。

今天各位出行,如果坐火车,不是选高铁就是动车吧?但是,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:那种速度慢、见站停的普通列车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?

大家有没有想过:到底是谁在乘坐普通列车?

我想大家肯定一下子就能给出答案:除非没有其他更好的交通工具,学生不会坐,城市人不会坐,主要是那些底层的老百姓,比如农民、农民工坐。

去年暑假和寒假回家,我特意选择坐慢车,16个多小时的硬座。就是要看看哪些人在坐慢车,看看慢车上还是不是过去那个样子。的确,主要还是农民、农民工在坐慢车。对农民工来说,选择坐慢车,比动车起码节约一半的钱,比高铁节约三分之二以上的钱。从深圳到武汉,高铁一等座要八百多,二等座五百多,但慢车的硬座不到两百。尤其是全家在外打工的,从深圳到武汉,可能要节约一千多元,这对于农民家庭来说可不是个小数目。

不过,慢车也没有过去那么挤了,因为农民工虽多,但很多都被动车和高铁分流了——既有主动的分流,也有被动的分流,因为价格便宜的慢车越来越少了。

大家可注意到,2015年12306网站通告的春运期间的加班车,三分之二以上的是非动车高铁。这个安排除了出于运输车次时间差的考虑之外,我觉得还有很人性的一面,因为说到底,加班车就是为了农民工而加,低价位的车符合他

们的需求。

而且,你会发现,普通火车与动车的氛围完全不同。

在动车上,相对比较安静,大家不是玩电子产品就是睡觉,相互间很少交流;但是,在普通火车上,熟悉的、不熟悉的,都在热烈地交流,还有打牌、吃东西的,也有用劣质手机放歌曲的,做什么的都有。大家都不担心打扰到别人,也没有人认为别人的做法对自己是一种干扰。慢车上的风格是粗犷的,是人间生活的那种氛围。

对比动车、高铁与普通火车,很容易就能发现这里的阶层差别、生活方式的差别,而且你还能感觉到:底层人的心理,比我们想象的要乐观得多,健康得多。底层的状况虽然普遍很“糟糕”,但大家还是“很听话”很乐天地活着,这里面的一个重要原因,就是他们如果在外边活不下去,还有家园可以退守。

骑摩托车回家的情况,大家可能在新闻里看到过了。每年春节,总有摩托大军回家过年。我的一个表哥,每到过年时就让他儿子坐汽车回家,而自己骑摩托车带老婆回家,路上要两天一夜。另一个表哥也是骑摩托带老婆回家,有一年在途中撞了人,不知是真撞还是被讹诈了,反正被人家扣了一天多,赔了一万多块才放人,半年的收入就这样打水漂了。

开私家车回家过年,在青年打工者中也越来越普遍。我待会进一步讲这个事情,因为它的意义大大超出了交通工具本身。

人与人之间联系的失落

打工的父母与孩子

每到年关,许多人迫不及待地赶回家,最大的期待就是见到自己的孩子。可是很多孩子,尤其是年龄在十岁以下的,跟父母并不亲近。父母回来了,见到孩子激动得要掉眼泪,但孩子却显得“无动于衷”,甚至躲一边去了。春节期间,很多父母还没有来得及跟孩子建立进一步的感情,就又不不得不离家。甚至,当父母对孩子仔细叮嘱的时候,孩子却催着父母赶快回城市去。

以下是我在前年寒假时记下的一个片段,让大家感受一下留守儿童的内心世界:

每次回家,在跑乡下的班车上总能听到最生动的对话。那一天,坐在我前排的是两个妇人,都带着孩子。

妇人 A 指着身旁的小男孩说:“我这孙子翻生(爱闹腾的意思),你煮饭他要吃粑(馒头),你做粑给他吃他要吃饭,高高兴兴地买鱼回来他要吃肉,把肉买回来,他又要吃鱼。吃饭也不点实(不认真的意思),饭含在嘴里不往下吞,要打他,他才肯吃。做作业手拿着笔不动,要抽几下才做几道题。有一回,我一拍子拍过去,我觉得也没有用力,但就是在他背上打了这么长一道口子(她做了一个比划),看着这血口子,心里又很过不去。但这孩子啊,就是不听话。生得贱,就要打!他六岁了,只要他爸妈打电话来,就躲得远远的,从来都不接。”

妇人 B:“哎呀,你看我孙子还只有四岁,也一样,他爸妈打来电话也从来都不接。”她又指着另一个女孩说,他姐姐七岁,每次爸爸打电话来,就要说上一两个小时,爸爸说他要上班了,她还舍不得挂……

留守老人与子女

农村的日常生活充满着深刻的悲剧。

自打工潮于上世纪 90 年代兴起以来,很多农村人一直在外打工,二十多年来与父母团聚的时间,平均到每一年可能就十来天。很多农村老人倒毙在田间地头,病死在床上,儿女都不在身边。没有来得及为父母养老送终,成为许多人的终身悔恨。

每次回家,看到我身边的老人摇摇欲坠的样子,我就觉得心里难受得很。留守儿童是苦,但是还有很多希望,对于农村老人来说,很多人是硬撑着过日子。

如果一个人为了生存,连爱父母、爱子女的机会都被剥夺了,你怎么可能指

望他去爱别人、爱社会、爱自然？你怎么可能指望他能用超出金钱的标准来衡量别人的价值？所以我想说：现代生活是一种让人心肠变硬的生活。

亲戚朋友之间

我觉得当前农村的亲情关系，很大程度上是靠老一辈维系着的。在老一辈那里，亲情关系处在一种相对稳定的时空里，但对年轻一代来说，大家的关系早已被现实割裂了。比如，我和我的众多表哥，小时候一起上山捉鸟，下河摸鱼，关系好得不得了，但这一二十年来，他们一直在外打工，我一直在外读书和工作，我们一年最多在过年时见一次，平均下来每年还不到一次，因为他们不是年年都回家。拜年的时候，大家也不再像过去那样，在亲戚家吃饭喝酒聊天，甚至留宿一晚，现在大家都骑着摩托车拜年，去亲戚家匆匆走一遭，放下礼物，客套几句，就要离开了。平时的生活啊、情感啊什么的，都没有来得及交流。

大家拜年，不再是为了亲戚间互相走动，馈赠礼物，交流感情，而只是为了完成传统和长辈交代的一项任务。

悲哀的是：如果老一辈都不在了，新一辈的联系也就慢慢断了。

在农村，还有什么可以将农民动员起来？

自从 2006 年免收农业税之后，中国农村的基层组织主要起着上传下达的作用，不再与农民的基本利益发生关系，也不再能将农民组织起来，农民处于“个人自治”的状态。

春节的力量

春节千里迢迢赶回家，亲人团聚，过年拜年，大家互相走动。过年的力量，亲情的力量，是当下动员中国人最有效的力量。这也是过年最让人感觉温暖的一面。

当然，以前过年时的各种集体活动，都已消失殆尽了。比如，我的家乡从前有一个词，叫“荡十五”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正月十五这天，不应该留在家里的，